

2004 年海内外中日关系研究述评

柯 惕

笔者所见 2004 年国内出版的有关图书有：加藤克子著、步平翻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 月出版的《日中战争中悲哀的军队——搜寻父亲记忆的旅行》；刘燕红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 月出版的《鬼子还会再来吗》；张连红主编、孙建成调查，江苏人民出版社 3 月出版的《日侵日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梁家贵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4 月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研究》；步平、高晓燕、笪志刚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月出版的《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董振平著，齐鲁书社出版社 6 月出版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盐务研究》；梅桑榆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7 月出版的《三百万日侨遣返实录》；美国柯博文著、马俊亚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 月出版的《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沙东迅编著，广州出版社 7 月出版的《广东抗日战争纪事》；戚其章著，天津古籍出版社 9 月出版的《甲午日谍秘史》；闻黎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10 月出版的《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陈先初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 月出版的《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唐正芒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11 月出版的《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重庆档案馆编辑，12 月出版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李秉刚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 月出版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

2004 年召开的学术会议主要有: 杭州师范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民国档案》编辑部共同主办, 于 4 月 23 日至 26 日在杭州召开的“中日战争与战争遗留问题学术研讨会”; 由韩国教科书运动本部主办, 于 8 月 11 日在汉城召开的中日韩第三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 由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 于 9 月 18 日到 19 日在北京召开的“战争遗留问题暨中日关系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

仅以笔者所见海内外相关学术著述, 对 2004 年研究述评如下。

一 中国的相关研究

(一) 日本侵华研究

近年来, 有关日本侵华的研究已从对重大事件的研究转入对相关专题的研究, 从横向的发掘转入到纵深的剖析。2004 年的日本侵华研究主要包括下面几个主题。

关于日本对中国的鸦片毒害。《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1 期发表了一组相关论文。曹大臣的《日本侵华毒化机构——华中宏济善堂》, 对日本在中国华中地区开办的贩毒机构进行了研究, 指出宏济善堂披着慈善的外衣却干尽了罪恶的勾当。它在 1939 年 1944 年的五年间贩卖毒品盈利 10 亿日元, “若用此款建造当时日本最新型翔鹤或瑞鹤级航空母舰, 即可建造 12 艘之多。此外, 宏济善堂还向特务部, 宪兵班, 宣抚班, 情报部等现地机关提供活动经费”, 为日本侵华提供了极大的物力支持。同时宏济善堂“破坏了中国禁政, 削弱了中国抗战力, 使日渐禁绝的鸦片流毒卷土重来”。文章除了进一步揭示日本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推行

毒华政策外,还利用此个案勾勒了毒化政策的直接恶果。同期许金生的《侵华日军对南京的鸦片毒害》,也指出“日军的鸦片统制政策解决了南京伪政府的财政问题,削弱了南京人民的抗战能力。使南京由全国模范禁烟城市迅速沦为一个毒流泛滥的毒品之都”。

关于日本的殖民经济。日本侵华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发展殖民经济,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张会芳的《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日系农场的殖民经营——以天津地区为中心》(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日本在华北殖民经营的成立目的,管理机构,内部组织,市场状况等作了较详尽的分析,指出日系农场的成立,本质上在于掠夺中国的土地,劳力资源,转化为其战争资源,并直接使沦陷区的各种生产条件恶化和实行农产统制,间接予战时农业以巨大创伤。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学蒲丰彦的《中日战争时期三灶岛的日本农业移民》(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利用日本冲绳地方的报刊和档案,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1937年12月日军攻占了原属广东中山的三灶岛后,曾从冲绳向该地派遣了约400名左右的农业移民,目的是给这个岛上的航空基地供给粮食,“或者也可能是出于军事警备上的需要。”在以往关于日本向中国移民的研究中,大多局限在东北地区,而此篇拓宽了研究的视野,故有较高的研究参考价值。

殖民教育研究。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王士花的《华北沦陷区教育概述》和周孜正的《汪伪的留日学生教育》(均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前者指出,日伪控制华北后,以新民主主义取代三民主义,推行封建复古教育,改变学校课程设置,修改教科书,强行普及日语教育,并以各种方式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控制;后者对汪伪派遣留日学生的目的,经费来源,留日学生的生活状况都作了介绍,指出“留日学生虽然被吹捧为中日亲善的象征之一,但实际上汪伪政府希图他们将来成为‘复兴事业’的技术

工具”。两篇文章均揭示了日本殖民教育的本质,即奴化教育。

日军暴行研究。本年度的日军暴行研究基本还是以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为主干,因为它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是日本军队施暴的最典型的事件。不过研究并未停滞不前。孙宅巍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进行了研究,他在《论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载《南京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指出:“差不多与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同步,即有英美记者向世界发出了关于暴行最早的快讯,稍后又有多家中国报刊发表了对从南京逃出难民的采访。”这些传播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右翼的谬论,因为他们声称南京大屠杀并无早期传播,并企图以此的来证明这一事件是事后人为制造出来的。经盛鸿和开云的文章《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新闻舆论的控制与利用》(载《南京师大学报》2004 年第 6 期),也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研究,他们的文章与前文相辅相成,指出正是“日本当局在指挥日军对南京进攻与大屠杀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控制新闻与操纵舆论的新闻政策”,以“严密封锁与掩盖日军的种种暴行”。此外,程兆琦的《侵华日军军风纪研究——以第十军为中心》(载《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即以日军第十军的军风纪为切入点,研究了个案研究。他利用残留下来的第十军法务部日志等文献进行了研究,指出“第十军滞留中国的短短数月间,国共两党在江南地区尚未形成有组织的反抗,日军控制相对‘安定’,如果暴行与所谓‘报复’等因素确实有关,日军暴行理当时最少的时期,然而,从第十军,华中方面军两级法务部日志和小川日记可见,第十军暴行仍可谓十分严重。”且所谓“日军军风纪严明”,所谓日军“犯罪率世界最低”,也完全不能成立。

(二) 中国抗日研究

1. 政治研究

田子渝的《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载《抗日战争

研究》2004 年第 1 期), 对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和王明在这一时期的工作进行了考察, 文章肯定了长江局的工作成绩; 又通过对中共内部大量资料的梳理, 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所谓王明右倾的错误, 认为毛泽东与王明在这一时期,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方面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主要分歧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王明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 严重的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文章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延安整风中, 毛泽东将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加以批判。特别是 1951 年 6 月, 经毛泽东修改的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对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加理论化与具体化。这些结论性的东西直到今天还在中共党史学界有着重要影响。徐则浩的《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的历史贡献》(载《学术界》2004 年第 6 期), 考察了 1938 年 3 月任弼时向共产国际的两次报告(一次书面报告, 一次口头说明与补充), 指出: 在任弼时报告后, 由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案》和《决定》以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 既在政治上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正确, 又在组织上明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 对开好中共六中全会有重大作用。文章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成文时间专门加以说明, 厘清了党史界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说法。

有关中共七大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研究, 翟昌民的《中共七大提出“建立联合政府”是战略目标还是策略口号》(《党的文献》2004 年第 3 期), 认为: 建立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目标; 中共七大制订了“放手发动群众, 壮大人民力量”的路线, 完整地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战略构想; 由于抗战后期形势发生突变, 中共调整了原有的战略部署, 这一战略构想未能如期实现。

近年来,史学界对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中的政治、军事、思想等方面研究颇多。王建朗的《尘封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2 期),通过对抗战时期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的梳理和研究,指出:通过文件,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对于关内地区,蒋坚持日本应干净彻底地撤军,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有时则更进一步,要求日军全部退到长城以北,废除战前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在关内若干地点的驻军权、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等特权。对于东北地区,蒋表现出较大的妥协性,未能将同是由日本侵略造成的东北问题与关内地区同等看待,而准备以特殊方法来处理,其方案颇多不切实际。但是,从整体构想来看,蒋对东北问题的处理,似不以“出卖”东北而名之。蒋的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以等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张丰清的《论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特点》(载《学海》2004 年第 1 期),分析了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特点。认为:蒋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于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其主要特点是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观能在抗击民族敌人的共同目标下结合起来。然而,这两种观点之间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从而决定了二者的结合是短暂的,它们的最终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谷小水的《抗战时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1 期),分析、评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抗战中的积极意义和局限,认为:抗日战争发生后,国民政府为应对敌方实力数倍于己的不利局面开始全面动员,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构成即为精神层域的宣传与发动。在抗战初期的数年间,国民政府于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开展了规模较为可观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

动,对民众认识形势、团结御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国共关系研究仍然引人注目。汤宇兵的《1939 年秋—1940 年夏国民党的南调命令及其影响》(载《安徽史学》2004 年第 6 期),对皖南事变的起源进行了新的分析、研究。作者认为:抗战初期的南调命令是国民党在发展和维护它的华中敌后利益,尤其是大别山根据地利益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由于抗战的新形势,国民党对在失去大举“剿共”手段之后的策略选择和反共部署,其实并没有多少及时而深入的考虑,尤其因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以来共产党在华中采取攻势策略,国民党更显缺乏心理和策略准备,南调命令最终在国民党内重重阻力下不了了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国共关系史上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皖南,国共都因为南调命令而发生了策略变化,两党由此不可避免地开始积累矛盾,直至事变发生。

抗战时期,作为互相对立的集权与民主的两种趋势,是如何在一场民族对抗战争中并存与发展的?王建朗的《浅议抗战时期民主进程中的几个问题》(载《史学月刊》2004 年第 1 期),分析了这两种趋势的走向与发展: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民主运动的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最终,固守一党专政体制的国民党逐渐失去了社会的支持。具有在野党与区域执政党双重身份的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了民主的旗帜,既竭力向国民党要求西式民主,又在自己的统治区域探索试行了新的民主制度,并发展出新的民主政治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对战争后期的民主运动发生影响的国际因素也不可忽视,美国对国民政府经历了一个从期望到失望的过程,而中国人民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从期望到失望的过程。从长远来看,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在民主问题上的一失一得,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

2. 社会经济研究

李云峰、刘俊凤的《抗日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的变迁》(载《西北大学学报》2004 年第 5 期),考察了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物资消费、婚姻家庭、文化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变迁。指出:由于国民政府西北开发战略构想的实施,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状况得到改善,民众的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迁既带有计划变迁、战时变迁等特点,也颇具近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时代进步性和复杂性。张根福的《灾祸、自然灾害与难民迁移——抗战时期安徽省个案研究》(载《民国档案》2004 年第 4 期),根据档案、史料,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安徽 260 多万难民的史实和复杂的迁移情况:就省内而言,主要是迁入皖南、皖西山区、中小城市及本县或邻县安全区域;就省外而言,主要分布于湘西、西南、西北各省及浙、赣等邻近省份。难民迁移给迁入地社会带来重要影响。王春英的《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影响》(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3 期),通过对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建立、数量和规模、特点、社会影响的考察,认为:抗战时期的难民收容所,是专门收留救助战争灾民的慈善福利机构,由政府救济机关及中外慈善团体和社会组织协同开办,是中国战时社会救济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存在与抗战进程相始终,虽具临时性、被动性,但其形式简捷灵活、数多面广,较为有效地救济了上千万难民。

温锐、游海华的《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4 期),以实证的方法论证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这一地区远离赣闽粤三省政治与经济中心,是三省政治的边缘化地区和社会经济的贫困地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边区开始了缓慢的现代化的进程。抗战开始,东南各省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学校、避战逃难人员等纷迁三省边区,给该地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与当年的交通通

讯建设、经济产业潮和边区政府管理职能的初步转型等融洽于一体,汇合成三四十年代边区社会的第一次浪潮。黎志辉的《蒋经国“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指出:支援抗战和建设新赣南是“赣南新政”时期社会动员的两大主题。蒋经国亲自动员干部、革除旧弊,树立新风;发动民众,措施、形式多样。其动员民众的思想既有国民党动员政策的脉络可寻,又受苏联模式感染甚钜。论证了中国以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应对一个现代化强国日本的野蛮侵略,而最终致胜,与此资源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有密切的关系。但这种“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原本是在抗日战争和中国当时处于由封闭型的农业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大前提下发生,被烙上典型的战时特征。动员过程中养成的被动型参与要转换成民众的主动型参与,尚有待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

有关国民政府的抗战经济政策的研究仍是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潘国旗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调整》(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分析了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的两项主旨: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论证国统区财政收支系统的重新划分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加强了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田赋征实政策则基本解决了抗战后斯的粮食问题。上述政策的显著特点是配合军事性,即都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特殊措施,从财政在平时自身所固有的独立性来观察,具有一定的消极性。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研究,董振平的《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认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盐务变革经历了盐统制、盐专卖与恢复征税三个阶段,应进行具体分析。在1941年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比较

注重民食,实行的盐税税率有升有降,但起伏幅度不大;1942 年后,其盐税政策的财政功能越来越强化,由于意外损失准备金、专卖管理费、战时食盐附税、国军副食费的陆续开征,盐项税率有大幅度抬升的趋势,国统区通货膨胀更加强了这一趋势。国民政府对抗战准备的缺失以及其内部的腐败影响了战时盐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张立杰(与董振平同期发表)的《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盐政改制》中指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盐政方面的改制与战时大后方的经济情况有密切关系,该文客观评论、分析了这次盐政改制的背景、经过、内容,认为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盐政改制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它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国民政府还是努力做到兼顾国计民生,且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潮流。霍新宾的《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粮食市场管理的个案考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2 期),通过对抗战前与抗战中广东粮食市场管理的考察,认为:战时,粤省政府试图以行政力量和法律手段对国统区粮食的经营及运销实施统一管理与调控,这样战时经济中自由的市场机制与政府统制行为发生冲突与较量:由此产生了这两重机制扭曲变形的黑市经济;也正因市场机制的存在,政府在粮管中采取了一些调运政策,以寻求统制经济下二者关系的动态平衡。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金融研究方面,金正贤的《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4 期),通过考察战时体制下国民政府的法币稳定政策、日本攻击法币的状况和法币作用的变化以及英法法币援助政策,汪精卫政权的储备银行券和法币的对立等,探讨国民政府战时法币政策的意义和局限性,以及战时货币政策遗留的影响和战后通货膨胀的原因。张天政的《“八一三”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2 期),通过对“八一三”时期上海银行公会

活动的考察,论证了上海银行公会在战时已具有与国民政府及其他团体配合协作,参与战时金融政策、法规的制订及组织实施,确立及巩固沪市战时金融体制,稳定金融市场,安定社会秩序,配合进行反对日本金融货币侵略斗争等方面的贡献。王红曼的《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借鉴了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的关系进行了剖析,集中论述了西南区域金融网络形成过程、空间结构及其特征。关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业发展,汪敬虞的《中国工业生产力变动初探(1933—1946)》(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通过定量分析、深入考察,认为:在战争的八年间,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除了东三省以外,几乎是普遍的衰退。

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社会研究成果颇多。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减租减息)转变的时间众说纷纭。龚大明的《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两个问题》(载《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通过考证认为,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是土地政策转变的开始,而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是其正式形成的标志。黄正林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载《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从劳动力整合的角度研究劳动互助,认为:边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对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源进行整合,包括两方面,一是把分散的个体劳动组织起来,使其由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二是通过移民政策,把地少人多地区的过剩农业劳动力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地区,同时把国统区和沦陷区流动到边区的难民安置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区。研究表明,延安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对建国以后农业以及农村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抗日根据地兴修水利

方面虽有提及,尚缺乏深入的全面性综合性研究。张晓丽的《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的水利建设初探》(载《中国农史》2004 年第 2 期)填补了这一空白。该文论述了抗日根据地水利工程类型、水利技术、水利成就及水利工程的作用和影响,对根据地的水利建设进行了比较全面地探索。

李建国的《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销及对边区的影响》(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3 期),论证了抗战时期,为克服经济困难,打破国民党当局对边区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大规模食盐运销活动,对当时边区的贸易、财政、金融以及军政机关和边区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边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陈志杰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的构成与经营》(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2 期),考察了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的构成、经营状况,这种公营商业数量不多但能力较强,在承担政府要求的保障供给、稳定市场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皖南事变后,公营商业由供给型转为经营型,虽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不少问题,但其经营方式、手段得以进一步丰富,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果,客观上为克服经济、财政困难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在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方面,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2 期),考察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工作、妇女放足、妇女婚姻、妇女文化教育、妇女社会劳动、妇女参政议政与社会意识诸方面,上述工作的开展使边区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治上,边区妇女取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经济上,妇女成为边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在社会生活方面,摧残妇女心身健康的缠足陋习彻底废除了;妇女的婚姻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文化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妇女组织在各种各样的识字组中,识字的同时接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了她们的社会意识和

民族意识。秦燕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3 期),考察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认为: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出现了法律与习俗、两性关系、新旧婚姻观念之间的冲突,表明了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边区政府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促进了边区的建设和持久抗战,并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继续实行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3. 军事研究

对正面战场的军事研究仍然引人关注。王奇生的《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3 期),认为湖南会战是 1944 年“一号作战”中交战时间最长,国民政府军队抵抗最为顽强的一次战役,并对战役的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等情况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湖南会战“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部署明显存有缺陷”,“各部队之间步调不齐,协同能力差”国军战斗力薄弱等,都是战役失败的原因。正如作者所言,这些研究“也许有助于从军事史的层面加深或纠正我们对抗战正面战场的既有认知”。而此文的学术意义在于,它突破了以往人们多以政治的视角,而不是军事的视角对该战役进行描述,并由此显示了该研究的客观性。

此外还有一些与军事相关的外延性的研究。江沛和张丹发表了《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1 期),从运动的缘起,运动在国统区的扩展,运动背后的党团纷争等方面,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作了描述和分析,认为从军运动及青年军在促进战时国统区社会风气的转变,提高国民革命军素质乃至促进军队改革,国民党整党及行政效率的改革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4. 外交研究

陈仁霞的《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始末⁴⁴/中德日三角关系背景下的历史考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2 期),利用德国外交部波恩政治档案馆的秘密档案,“东亚综合事务”“政治四处”等档案及已发表的“德国外交政策档案(1918-1945)”等资料,对九一八事变后到抗战爆发这段时期内的中日德三国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作者认为,德国不顾国民政府的苦苦挽留,强行撤回已在华 10 年之久的军事顾问,择强弃弱,倒向日本,对当时的远东乃至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德日两国都把德日关系置于它们同中国的关系之上。也许,希特勒德国之所以最终撤回在华军事顾问,是因为预感到中国将失去这场中日战争。该文的价值在于,利用了较多的原始资料,比以往更准确地描述了这一史事。

5. 战争遗留问题研究

赴日劳工问题仍是本年度研究的热点之一。居之芬的《论战后华工归国及遗留问题》(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4 期),利用天津、青岛和上海等市的档案资料,对赴日华工遣返批次,人数作了分析研究,并据此对赴日劳工总数进行了论证。指出日本外务省 1946 年 6 月为应对东京审判作了“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对日本 35 个企业 135 个事业场的华人劳工总数进行了统计为 38935 人。但是这个数字并非实际被掳华工的总数。因为“据接收华工档案和劳工证词发现,主要是该报告书漏报了使用华工的日本企业和事业场。此外“报告书”称战后遣返在日华工 30737 人,再加上死亡及下落不明者的人数正好为 38935 人,似乎能自圆其说。但是,据中方接收华工档案记载,仅天津塘沽一地就接收劳工 18 批,据美军通知从日本遣返实有 30752 人,已超过报告书提供的数字。这些数字均表明,日本政府战后在统计被掳至日本的华工总人数及战后遣返人数时均存在重大遗漏和误差,亟

待纠正。

蒋清宏的《苏军拆迁东北矿业与赔偿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2 期),提出按照国际惯例,苏军应该在撤离东北时把政权移交给中国政府,然而,苏军竟置国际法于不顾,对东北的日资工矿业以“战利品”的名义疯狂拆迁,总价值在 20 亿美元以上。苏军的拆迁还涉及到对日索赔问题,美国极力主张将苏联拆走的工业设备纳入到日本赔偿范围之内,但是遭到了苏联的坚决反对,理由是拆迁的财产是苏军的“战利品”,而不应包括在赔偿范围内。苏联拆迁东北工矿产业延缓了战后东北的经济恢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东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二 海外的相关研究

(一) 英语国家的研究

以往的学者们和政治家们一直以“日本”和“中国”为整体概念来讨论其早期历史,好像近代民族—国家在这些地区生成很久了。傅佛果编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论:日本与中国》^①一书收录了 8 位研究东亚的著名学者的论文,对这种看法提出挑战,认为直到 19 世纪,日本和中国才开始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该书揭示了这种看法是如何扭曲人们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分析和正确理解的。该书认为,日本和中国的民族~~44~~国家形成较晚,也远没有民间神话和政治文化所宣扬的那样统一和完整;关于早期国家认同的错误描述不仅歪曲了历史事实,而且成为当今民族主义宣传的助力。作者回答了诸如“日本”和“中国”何时成为日本和中国、两

^① Joshua A. Fogel, *The Teleology of the Modern Nation-state: Japan and Chi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国民众何时和为什么开始以民族⁴⁴/国家的观点而非地方的观点来认定其身份和利益等问题。该书的作者们抛弃了西方的民族⁴⁴/国家概念,用中国和日本的本土名词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探讨。该书可读性强,对从事或不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过去 20 年中,学者们对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中日互动关系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但主要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战争。傅佛果编的《晚清中国与明治日本》^①一书有所不同,主要考察的是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共同点。本书涉及的时间始于幕府晚期,中经明治时期,止于大正早期,大体上是 1850 年代中期至 1920 年代末期。毫无疑问,这是中日交流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日本人开始漫游中国各地,数以万计的中国男女青年前赴日本留学,数以百计的日本人应聘到中国学校担任教师。令人遗憾的是,由于 1930 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使这种交流活动戛然而止,直到 1970 年代才得以恢复。

菲利浦·约维特专著《日俄战争(1904—1905)》^②是西方第一部详细研究日俄战争的专著。日俄战争是 20 世纪初叶大国之间的正规部队的一场大对决,使用了最先进的火炮、地雷战、战壕战、游击战、电话通信设备、侦察气球;1905 年 3 月的奉天战役是此前世界上发生的最大的一次战役。日俄战争不但影响到远东之中、日、俄、韩四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后虽有不少西方观察家发表了种种评论,但 1914 年第一次世界

① Joshua A. Fogel, *Late Qing China and Meiji Japa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 2004) .

② Philip Jowett, Alexei Ivanov, Andrei Karachtchouk,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 - 1905* (Osprey Publishing, 2004) .

大战的爆发说明,他们的结论并非都是正确的,他们对日俄战争的研究远谈不上深入和充分。本书描述了日俄战争的进程,配以大量的地图、表格、照片等,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安克强和叶文心编的《在朝阳的阴影下:日本占领下的上海》^①一书,把目光集注于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上海的中外普通民众忍受日本人进攻和占领的史实。与以往描述爱国人士英勇抗敌或者卖国汉奸与敌合作的叙事架构不同,本书揭示了上海居民利用各种各样的社会网络突破日本占领当局种种束缚的情况。他们采取这些策略的目的是要在暴日统治之下保存中国文化并发展经济。

《从上海到上海:一名帝国陆军医官的战争日记(1937—1941)》^②记录了作者在日军侵华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日记主要记载随军慰安妇、军事间谍和传教士等的情况。据日记透露,作者是日军中第一个正式受命为随军慰安妇做身体检查的军医官。这项检查制度起源于1937年,当时有一批新来的慰安妇被派到上海为日军服务。慰安妇是日军统帅部为在军队中减少性病而创设的,作者在华期间一直负责慰安妇的身体检查。作者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其父在Fukuoka的红灯区开设一家私人诊所,前来就诊的病人多为妓女。作者从小在诊所中耳濡目染,所以想在长大以后成为一名妇科医生,为职业女性服务。1945年以后,新闻界经常谴责作者强迫妇女在战争期间充当慰安妇,作者最终将战争期间的日记整理出版以回应这类攻击。

① Chrisian Henriot and Wen-hsin Yeh (ed.),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Tetsuo Aso, *From Shanghai to Shanghai: The War Diary of an Imperial Japanese Army Medical Officer, 1937-1941* (Eastbridge, 2004).

多诺万·韦伯斯特的专著《滇缅路：二战时期中缅印战场的壮丽诗篇》^①是西方关于二战时期滇缅路的最详细最深入的研究。作者曾亲赴滇缅路沿线，考察战斗地点和公路遗迹，所以能够在书中描述沿线的泥淖、水蛭、高温等不利条件，历数盟军和日军经历的种种苦难，并结合自然条件讲述双方的战略战术及战斗情况。

(二) 日本的研究

2004 年日本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主要是围绕抗日战争和东三省等几个热点展开，从时间上来说，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以下进行具体介绍。

1. 民国外交体制的全面研究

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该书为本年中国外交研究的最大收获，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作者研究的中心是中华民国前期外交，大量利用了大陆和台湾的有关资料，对中国近代外交行政制度的确立、文明国化和不平等条约废除的交涉、中国传统外交的宗主体制以及空间认识、外交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诸方面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论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本书不是专门讨论中日外交，所以只有一部分涉及到中日关系，如关东大地震和中国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山东问题，特别是围绕朝鲜中国租界的废除所进行的中日外交交涉，对于中国国内不太涉及的朝鲜的中国租界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2. 日本的台湾统治研究

由台湾史研究部会编辑、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日

① Donovan Webster, The Epic Story of the 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 in World War II (Harper Perennial, 2004).

本统治下台湾的支配和展开》(日本统治下台湾の支配と展开),是日本和台湾学者的论文集。该书对于日本统治期间的基本法和台湾统治机构的形成问题,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户籍制度,对台湾的具体统治和经营方法,台湾邮政系统的建立和治安问题,统治初期的铁道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于弄清日本统治台湾的全貌,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3. 日本的中国东北统治研究

有两本书值得介绍。其一是竹中宪一的《满洲的中文教育》(満州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柏书房出版。该书探讨了从日俄战争开始到“满洲国”建立,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中文教育。建立学校,进行当地语言教育,在台湾,只是在有限的范围进行。而在东北,不仅是公的教育机关,而是作为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一环,通过民间学校、实业补习学校、青年训练所、公司、电台,大力倡导,并采取了奖励政策。在上世纪 20 年代,东北的日本人处于少数,要进入中国人的经济领域,以中国人为顾客,奖励政策对于日本人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都是必要的。这在日本外语教育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和英国、荷兰的殖民政策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东北是日本的“移住殖民地”,进行了大量移民,中文教育成为必需。但随着日本战败,其东北的统治瞬间土崩瓦解,这个问题也没有引起重视。作者对此倾注了很大精力,编辑出版了有关资料,也进行了调查和访问,所以该书资料详实,分析独到,特别是作者特意指出,在作为租借地的关东州,实行的是“内地延长主义”,和日本国内没有大的不同,而满铁附属地则为了适应东北的特殊性,采取了“现地适应主义”,其中文教育政策也有很大不同,值得注意。

其二是塚濑进的《满洲的日本人》(満洲の日本人),吉川弘文馆出版。日俄战争之后,进入东北的日本人开始增加,到 1932 年

“满洲国”建立之前,已经达到了 23 万人。作者论述了这一阶段日本人在东北的生活。作者在 1998 年出版了《满洲国“民族协和”的实像》,指出,在东北生活的日本人对周围的中国人等其他民族采取的是不关心和蔑视的态度,“满洲国”政府也没有努力消除民族间的矛盾,所以并不存在达成民族协和的状况。本书则是对“满洲国”以前东北的日本人的活动进行了探索,作者主要利用了 1907 年 11 月在大连创刊的《满洲日日新闻》,和各种人名录,力图再现当年在东北的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作者指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人开始进入东北,日俄战争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员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日本政府开始鼓励移民,但他们主要生活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其中心是满铁人员和关东州的官吏们,从事大豆等输出贸易和专门输入日本商品的日本商人并不多。而服务这个日本人社会的则是低报酬的中国人劳动者们。这里的日本人社会是一个和中国人完全不同的世界,紧随国内潮流,赚了钱就回国,对东北的关心度很低。该书对于人们解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东北的日本人社会很有参考价值。

4. 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中日关系研究

其中有两本书需要重点介绍。关于日军性暴力,有石田米子、内田知行主编的《黄土村的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没有完结》(黄土の村の性暴力——大娘たちの戦争は終わらない 4)创土社出版。该书分两个部分:证言、资料和论文。性暴力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除了慰安妇,也包括强奸、轮奸等暴力行为。该书的作者们,从 1996 年 10 月开始,到太行山深处的山西孟县农村进行调查,到 2003 年 3 月共进行了 18 次调查取证,第一部分收集了这些证言。1998 年 10 月,在他们的协助下,其中的 10 位被调查受害者,在东京的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论文部

分分析了日军在山西的性暴力及其产生的背景。指出,在慰安所型和南京型⁴⁴攻占时集团强奸型之外,在山西省发生的不是慰安妇型,是分散的在前线发生的暴力行为,包括扫荡时的集团强奸、日常发生的军事威胁之下的性暴力。其在实地调查中反映出来的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分析值,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和学习。

吉见义明的《毒气战和日本军》(毒ガス战と日本军),由岩波书店出版,是第一部全面描述日军毒气战的著作,对于日本社会认识毒气战的历史,具有很大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政府故意隐瞒毒气战的真相,虽然陆续有资料发现和报道,但一般日本人对日军毒气的使用历史,仍然不太了解,也缺乏综合的历史著作。该书对于日军什么时候,在哪里,怎么使用毒气,都进行了全面介绍,勾画了日军毒气战的全貌。日军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从1915到1930年,开始了开发研究,1930年10月在台湾的雾社事件中进行了尝试使用。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曾一度计划使用毒气,但对世界舆论还是有所畏惧,1936年后由于军部控制了政府,开始解除限制。七七事变之后,在华北、华中和在东北对付游击队时开始正式使用。从1938开始到1941年,开始进入经常化阶段。之后在讨伐、进攻、激战、苦战时,都曾大规模使用。除了中国战场外,该书对日本在东南亚太平洋战场的毒气使用,美军攻入日本本土时的毒气战计划,战后的处理和遗留问题的处置也进行了介绍。

关于战后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法律文化社出版的西村成雄主编的《中国外交和联合国的成立》(中国外交と国连の成立),收集了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学者的有关联合国组织化过程和中国“大国”化起源的文章,对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获得的国际地位,以及国际地位的历史连续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日本关

系也有涉及。

除以上专著外,还有以下学术论文引得关注。

清水稔的《关于清末湖南留日学生的动向》(清末の湖南留日学生の动向について),刊载于佛教大学的《文学部论集》第 88 号(2004 年 3 月),论述了湖南留日学生的活动,指出,在办杂志、革命组织和国内的反清活动等方面,湖南留日学生都起到了带头作用。

樋口秀实的《围绕东三省政权的东亚国际政治和杨宇霆》(东三省政权をめぐる东アジア国际政治と杨宇霆),发表于 2004 年第 7 号的《史学杂志》,论述了 1929 年 1 月 10 日发生的刺杀杨宇霆事件。一般认为,1928 年 5 月 3 日济南事件之后,张学良准备年末易帜,所以才刺杀了亲日的杨宇霆,但作者不同意这个结论,他根据奉天日本总领事馆的报告,认为该事件是内部权力斗争所至,杨宇霆不是亲日一边倒,而是为了实现东三省集权化的构想,进行了全方位外交。

内田尚孝的《华北分离工作的展开和国民政府的对应》(华北分离工作の展开と国民政府の対応),登载于《中国研究月报》2004 年 3 月号,该文分析了从 1935 年 9 月开始到 12 月间的中日外交冲突和交涉,对于中国方面的对应和何应钦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结局是各有妥协,特别是日军不得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的地方行政机构而设立,对日本是一个失败。

柴田善雅的《陆军军命商社的活动-昭和通商株式会社备忘录-》(陆军军命商社の活动——昭和通商株式会社覚書),发表于《中国研究月报》2004 年 5 月号,介绍和分析了昭和通商株式会社的历史,指出战争期间,既有进行关内占领地物资调运的日本商社,也有向傀儡政权运送兵器和为日本陆军进行物资调运的特殊

公司,昭和通商株式会社表面上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公司,实际上和陆军有特殊关系,是御用商社,不只在中国战场展开业务,进行武器输送和鸦片买卖,在 1940 年后,更根据东南亚战场的需要,扩展业务,其商社的调查部也进行了情报收集。该商社在战败后的 1945 年 8 月 20 日废业。从该文可以看出,战争期间的日本商业活动,或多或少都和战争有关系。

金丸裕一的《战时江南图书“掠夺说”产生的历史背景》(战时江南图书“略夺说”诞生の历史的背景),刊登于《历史学研究》2004 年 7 月号。他指出,日军动员大量的特务和军人,从上海、南京、杭州,掠夺了 80 多万册书籍,运回日本的说法来自日本,但并不是事实。无论该文是否正确,都让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即特别是涉及抗日战争研究方面,需要有特别谨慎的态度。否则,有可能伤害我们的研究事业,有时也可能会授人以柄。

(责任编辑:荣维木)